

毛主席的教导，我们一刻也没有放下。党和毛主席领导的新农民，读眼睛擦亮了，什么牛鬼蛇神我们统统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企图是永远帮铁底铁江山，你们搬上一万年自己点起来的火，现在已烧到了你毒草统统烧尽。

肖洛霍夫的叛徒真面目

蔡 辉

历史的法则则是异常严峻的，它在斗争的紧要关头，总是无情地迫使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和叛徒们，撕下自己的面纱，暴露出真正的面目来。肖洛霍夫就是如此。一九六五年十月，这位号称“共产党员”、“无产阶级作家”的肖洛霍夫，受党惊惶地接受了连国的资产阶级作家萨特都不愿接受的诺贝尔文学奖——用萨特的话说，就是接受了“一种保留给西方作家和东方叛徒的荣誉”①。

自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来，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机构一直在俄罗斯的作家中千方百计地搜罗“东方叛徒”，尽管他们冠冕堂皇地宣称自己是如何如何地尊重“文学才华”，但是，他们却不承认被列于称颂过的高尔基是“共产党员”、“无产阶级作家”的肖洛霍夫，受党惊惶地接受了连国的资产阶级作家萨特都不愿接受的诺贝尔文学奖——用萨特的话说，就是接受了“一种保留给西方作家和东方叛徒的荣誉”①。

一九三三年，也就是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后的第六年，这个奖金的颁发机构第一次把奖金授给了俄罗斯作家。这个作家不是高尔基，也不是其他拥护社会主义革命的文学生工作者，而是极端仇视十月革命、逃亡巴黎的“白俄作家”蒲宁。

一九五八年，他们又本着同样的政治目的，把奖金授给了另一个臭名昭著的叛徒：反共小说《瓦瓦医生》的作者帕斯捷纳克，国际反动派并且由此掀起了一个反苏反共的浪潮。西方资产阶级报刊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所起的宣传表示了极大的赞赏，一家在维也纳出版的报纸《海内·库尼耳》甚至于称它为“反对共产主义的诺贝尔奖金”。当时，广大的苏联人民愤怒地谴责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个“西方的工具”，并且对于帕斯捷纳克的叛徒行径进行了一致反对的声讨。那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苏联《真理报》也不得不说：“反动的资产阶级诺贝尔文学奖奖金的”，“是违反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就连肖洛霍夫也勉强地出来表示一下态度，谴责帕斯捷纳克为“国内白匪”②。

很有讽刺意味的是，曾几何时，肖洛霍夫竟然感激涕零地接受了曾被他们谴责为授给“国内白匪”的诺贝尔文学奖。当然，肖洛霍夫的“才华”还不至于使他的恩惠因此种地步，即公开承认它所接受是一种对于叛徒的奖金。于是，他和他所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作家们，便想方设法使广大的苏联人相信：诺贝尔文学奖已经改变了性质，它已经变得异常的“客观公正”了。苏联作家协会的一位负责人甚至不惜无耻地同美国合众社的发表家说，这是“对社会主义文学的伟大的褒奖”。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也出来出言，说什么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无可争辩的成绩博得世界承认的又一证明”③。

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命运》（旧译《一个人的遭遇》）在一九五六年发表后，现代修正主义宣传机器大忙而特忙。苏联《文学报》专论称小说主人公的性格为“俄罗斯性格”，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处的报告盛赞“肖洛霍夫把英勇、刚毅、自豪和灵魂美刻画为苏联人性格的自然流露”，并且声明这本小说在苏联文学史上具有“原则意义”。接着，又公开开辟了“新阶段”，打开了“新篇章”……调子越吹越高，以后竟把小说主人公捧为“全世界千百万人的高尚道德的典范”④。

不仅如此，赫鲁晓夫还亲自出马，大吹肖洛霍夫为“杰出的艺术家”，他在三年内，并曾两次为他做生日，挂勋章，发奖金，带往美国访问，提升中央委员。苏共新领导上台后，不但不落伍，忙着他为庆祝十六岁，发行印有肖洛霍夫头像的纪念邮票。

西方资产阶级之与寇相偕而行。根据《一个人的命运》改编的影片，仅在三年内，英国就有一千二百家影院上映，法国有两千多家影院上映。一九六五年，他们又通过法国，雇用作者以诺贝尔文学奖。

为什么这个小说受到现代修正主义者与西方资产阶级如此崇拜？因为它是苏联二十大的反叛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一部代表作。它首先开列，在苏联文坛上树立了一面反对革命战争的现代修正主义文艺黑旗。

贩卖和平主义 反对革命战争

一个作者通过索科洛夫的“悲剧”，用“一个人的命运”作为整个人类命运的缩影，描绘革命战争，贩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

反法西斯战争开始前，作者给索科洛夫搬设了一个和平幸福的环境，甜言蜜语地要索科洛夫的老婆伊琳娜说：“天下没有比她更漂亮更爱恋你的女人”。生了三个孩子以后，“他照常不再来忙了”，完全躲入市俗生活的避风港。积蓄了一些钱，他就买牛，造房子，造储藏室，置办坛罐罐。造好了这个“安乐窝”，他就得意地喝起来：“人生在世，还需要什么？”

老婆、孩子、牛、食、住，这就是索科洛夫至高无上的“幸福生活的”全部。小家庭幸福就是这一切，个人幸福高于一切。

在肖洛霍夫看来，只要没有人来干扰他的主人公这个“奶牛场主”的“幸福生活”，这就是人生最大的乐趣，管他什么国内外敌人的捣乱与破坏，管他什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人民的痛苦，和就是幸福。

我们来看索科洛夫的精神世界里看不到丝毫高尚理想的影子，有的只是市俗性格与市俗哲学。作者给这个主人公布置的画面，并不是为了揭露和批判，而是把市俗生活活画加以美化，宣扬个人幸福至上与和平才有幸福的思想，以腐蚀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并为全面反对革命战争作伏笔。

瞧：反法西斯战争爆发了，肖洛霍夫以无限同情的笔触，花了大量的笔墨把伊林娜描写成同色情的被强奸者受害者。车站送别时，她放声痛哭，哭哭啼啼，嘴唇苍白地，眼睛红肿，泪流而无光，指肩肩宣布上战场，她始而扑在索科洛夫的胸上，继而双手紧紧地勾住索科洛夫的脖子，“浑身哆嗦”，“一号一语地说：‘我的……亲爱的……安顿别少’……我们……今后……再也……不能见面……见面……”这里，作者企图告诉人们是法西斯战争夺走了索科洛夫一家的“和平幸福生活”，造成了人间生离。因而直接导致了否定反法西斯战争的反动逻辑。

随着情节的开展，作者用渲染对比的手法，编制了一幅战争就是灾难的“人类幸福毁灭图”。作者告诉人们：反法西斯战争是以索科洛夫一家这个个人幸福全部毁灭而告结束的。一颗炸弹落在索科洛夫的屋子上，美人、儿子、山羊、土地，统统荡然无存，遗留给她的却是深渊、杂草和荒凉的草原。虽然作者让索科洛夫的儿子力里逃进上，上了战场，成为大尉连长，获得许多勋章、奖章，他还有最后的“欢乐和希望”；还可以为“天

够了！可敬的魔术师们，尽管你们具有杰出的撒谎本领，但是，对于肖洛霍夫获奖的受宠若惊的极度兴奋，却使我们竟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瑞典科学院诺贝尔奖金委员会的主席埃斯特林早就对于授奖的理由作过公开的解释——并不是他们改变了立场，而是因为：“虽然肖洛霍夫先生是一位有信仰的共产党员，但在他的四卷本巨著《即《静静的顿河》》——引者）中却根本没有谈论意识形态问题”⑤。

苏共中央的领导和苏联部长会议的部长们，苏联的大小小小的评论家们，你们不是一口咬定授予肖洛霍夫诺贝尔文学奖奖金是因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承诺，是对社会主义文学的伟大的褒奖”吗？原来，你们所标榜的“社会主义文学”，就是这样一种资产阶级所提倡的，所谓没有思想倾向的“超阶级”的文学！你们口口声声吹嘘自己遵循列宁的原则，但你们连列宁提出的“打倒非常态的作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的”口号都忘得一干二净，这难道不是天大的讽刺吗？

实际上，所谓“根本没有谈论意识形态问题”的文学、“超阶级”的文学，是根本不存在的，它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学者卑劣愚昧的、欺骗读者，掩盖其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服务的卑鄙面目的一种文字符号。在现在的世界上，一切文艺学术，都从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从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因而，也就必然贯穿一定的思想意识，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所标榜的所谓不涉及思想意识的文学，实际上却在千方百计地散播着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意识，具有反动的政治倾向。

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就是这样的一部“巨著”。只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去分析一下这部篇幅小说，就不难发现，肖洛霍夫之所以能够同帕斯捷纳克一起“载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名册”，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他的这部“四卷本的巨著”和帕斯捷纳克的《瓦瓦医生》实在是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说，在《瓦瓦医生》中，帕斯捷纳克是通过一个仇视十月革命、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的旧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日记文，恶毒地描绘了一幅俄国新生活正在新社会里“毁灭”的图景，对苏联红军和十月革命胜利生活进行了各种诽谤；那么，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洛霍夫则是通过歌咏一个疯狂地和红军作战的匪兵黑巢里的反革命分子黑巢利高里，恶毒地攻击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革命战争的“不人道”，恶毒地诽谤了葛利高里“美好的心灵”，使葛利高里失去了“和世界相联系”的一切，而且嘲笑了麦列美一家工人的和平幸福生活的宁静生活。在反对革命战争发出了不加掩饰的诅咒。

在现在这场伟大的苏共第三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肖洛霍夫指责一些苏联作家为“叛徒”，并且说：“再没有比诽谤自己的母

亲，卑鄙地侮辱他和动手打他更表卖更可恶的了！”其实，这些话何尝不适用于肖洛霍夫自己呢？早在二十几年前，他就已经用他的《静静的顿河》去诋毁十月革命的道路了，早就在动手打自己的“母亲”了。他所打的，是斯大林，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美国的资产阶级报刊以其特有的阶级敏感清楚地看到了小说《静静的顿河》的强烈的反共意识，因而表示了一定的赞赏。当肖洛霍夫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奖金的时候，《星期六评论》就非常兴奋地写道，“获奖的这个俄国人”，“代表的正是那些攻打红军的顿河哥萨克人”。但是，通过他的小说中的人物表达到了对共产主义教条和策略的某种怀疑”。人们不难看出，西方反动的资产阶级报刊之所以看中肖洛霍夫，正是由于这个重要的原因，而不是由于什么别的理由。

值得人们进一步深思的是，二十年前（一九四六年）肖洛霍夫也曾一度被提名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为什么当时的西方资产阶级没有选中他，直到一九年后（一九六五年）才又“发现”了他的“天才”？这里有什么奥秘呢？

窥破了，道理也很简单。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篡夺苏联的领导权以后，肖洛霍夫毕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于彻底暴露自己的真面目，因此，西方资产阶级虽然对他的《静静的顿河》十分欣赏，却还不可能对他十分放心，因而采取了一种“等观瞧”的态度。那时，肖洛霍夫虽然已经在自己小说中攻击黑巢的战争，攻击十月革命，但是，他不得不得在某些场合不自觉地讲一些歌咏十月革命、歌颂斯大林的话。过去，他也和赫鲁晓夫一样，把斯大林称为自己的“父亲”。直至一九五三年斯大林不幸逝世的时候，肖洛霍夫还曾假惺惺地说：“父亲，别了！永别了，亲爱的终身都热爱您的父亲！”并且发誓，要把对斯大林的一切“神圣崇拜永远留在心灵里”⑥。

但是，曾几何时，在一九五六年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他便公开投进了疯狂地反斯大林的赫鲁晓夫的大怀抱，并且与赫鲁晓夫密切结合，对于斯大林领导时期的、苏联党在文学方面的主要领导人之——法捷耶夫大举攻击；写出了他可以称之为现代修正主义文学标本的《一个人的遭遇》，成为赫鲁晓夫在苏共文艺界进行修正主义的领袖手段。正因，正如他所发誓的那样，不管赫鲁晓夫飞到那里，他和他在“思想上”永远永远“在一起”。要其个人作保证的是，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也就是在这位肖洛霍夫，竟然厚颜无耻地宣布自己反对赫鲁晓夫具有有一种“说不出的”男人的“爱慕之情”。

赫鲁晓夫及其继承者当然也格外赏识这个具有特殊作用的忠实帮办。因而在他的头上，不仅挂着一块“党员作家”的头衔，而且还是斯大林奖金的获得者、历届最高苏维埃的代表。这一

要伤害他的心灵”，还让他雷克凡尼亚的死于法西斯炮火下的父亲，不让孩子知道法西斯侵略的罪恶。作者通过这个情节，意味深长地提出了一个如何消灭战争的问题。它说明：只要索科洛夫爱瓦尼亚那样，把阶级仇恨、法西斯的残暴、战争的观念——全抛入从人的头脑里消灭掉，人道主义，代偿相悖，和社会主义，代偿相悖，就可以“化为和平”，天下太平了，不，决不是这样！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要消灭战争，首先必须消灭帝国主义制度。儿童是未来世界的人民，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因此，必须教育他们牢记血泪仇，不忘阶级恨；必须教育他们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他们懂得什么是战争，什么是非正义战争；要培养他们敢于用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的勇气，敢于为打败帝国主义而作出一切牺牲的决心。不是人道主义代代相传，而是革命精神代代相传，不是人道主义代代相传，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代代相传，这才是彻底消灭战争之路。肖洛霍夫指出的消灭战争之路是一条投降主义之路。它暴露了现代修正主义者不仅自己实行和平主义、投降主义，甚至要腐蚀儿童，把下一代推入和平主义、投降主义的黑暗深渊。

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新路线”

看过小说《一个人的命运》，我们一点也看不到苏联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英雄主义面貌，一点也听不到苏联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高昂的斗争歌声，有的只是索科洛夫家的家庭反战以及他的“痛苦”、“幸福”和“胜利”。作品通过索科洛夫“一个人”的命运，把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讲为构成人间“悲剧”的一场大闹剧，它恶毒地丑化反法西斯战争，贩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思想；鼓吹投降比斗争好，和平高于一切，活命高于一切。

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是从属于一定的政治的、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我们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帝国主义即将走向全面崩溃的时代。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之间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决战。以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为政治代表的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级，害怕革命，害怕战争，害怕他们既得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因此，他们在政治上就要实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阴谋、鼓吹、美英的投降主义路线。《一个人的命运》、鼓吹和平高于一切，活命高于一切，美化反法西斯战争，正是赫鲁晓夫投降主义的政治路线在文艺上的反映。因此，它是对内服务于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级，对外效忠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麻痹广大劳动人民革命意志的反革命作品。

这一样一反革命作品上市以来，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评论家居然把它作为一面旗帜高高举起，说它开辟了“新阶段”，开辟了“新时代”，说它“制定了一条从思想上、艺术上处理战争题材的新路线”。现代修正主义的作家、艺术家们更把一批批地拜倒在它的面前，竞相仿效，写出了许多宣扬和平主义、贬低苏联卫国战争的作品，什么《生者与死者》、《一寸土》、《第三个牺牲者》、《克利托夫卡车站上的一件东西》、《士兵之歌》、《熊尔金斯之敌》、《给初生者以和平》等等，谬种流传，贻害无穷。

“一个人的命运”这条黑旗究竟体现了什么样的“新路线”呢？这就是根据苏共二十大要伤害他的心灵”，还让他雷克凡尼亚的死于法西斯炮火下的父亲，不让孩子知道法西斯侵略的罪恶。作者通过这个情节，意味深长地提出了一个如何消灭战争的问题。它说明：只要索科洛夫爱瓦尼亚那样，把阶级仇恨、法西斯的残暴、战争的观念——全抛入从人的头脑里消灭掉，人道主义，代偿相悖，和社会主义，代偿相悖，就可以“化为和平”，天下太平了，不，决不是这样！

连串的头衔，至少在当前还可以迷惑一部分不明真相的苏联人民以及国际文化界的人士，在他们中间起到一种欺骗作用。

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这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的灵媒。因此，肖洛霍夫便十分起劲地在苏联读者以及国际文化界中兜售苏美文化合流的货色，成为促使苏美文化合流的一个急先锋。

一方面，他在苏联国内大肆宣扬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向广大的苏联读者灌输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反动思想；另一方面，他还一改过去“躺席”的生活方式，一次又一次地出国奔波，到处吹嘘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的作家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作家们一起采取“联合行动”，“具体地发表意见”⑦。因此，他对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乞求说：“让我们互相往来吧！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争论和斗争的象”。因此，在欧洲作家会议上，他声嘶力竭地呼吁作家们应该象美、英、法三国的“大政治家们和外交家们”一样，“达成协议”，“找到共同的语言”⑧。

目的何在呢？目的就在于维护苏美两国统治集团的利益，不准别人革命，肖洛霍夫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战争，无论是被压迫人民发动的革命战争，还是被侵略民族进行的解放战争，他都要全世界作家们“首先”跑出来反对！“而且”还要比那些说“美”的人说在前头”。总之，他自己背叛了革命，不准别人革命！他不仅自己不准别人革命，而且还企图在世界上的一切作家们“联合起来”，“具体地”不准别人革命！

正是因此这样，肖洛霍夫不仅受到赫鲁晓夫及其继承者的恩惠，而且同时受到了西方反动的资产阶级的赞赏。

事实表明，并不只是被苏联人民称为“西方的工具”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改变了性质，而且肖洛霍夫已彻底地撕下了自己的遮羞布，变成了赤裸裸的“西方的工具”，反动的资产阶级找到了一个比帕斯捷纳克更加有用的“东方叛徒”。

可以供肖洛霍夫以及肖洛霍夫所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家们：且慢得意，且慢骄傲！既然你们已经公开地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你们就必须得向苏联人民及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的唾弃。历史的车轮将无情地碾碎前进道路上的这一切障碍。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事业，必将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永载其美其善；而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也将在这场战斗中蓬勃发展，而且永远成为被压迫人民起而斗争的旗帜和号角！

注：①萨特向瑞典新闻界发表的声明，载法国《世界报》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②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致肖洛霍夫的电。
③《纽约时报》一九六五年十月十四日。
④罗伯特·J·克雷斯曼：《诺贝尔文学奖是政治性的吗？》（见《纽约，父亲！》，载苏联《真理报》一九五三年三月八日）。
⑤在维申斯卡亚宣读迎接赫鲁晓夫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见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苏联《文学报》。（赫鲁晓夫在苏联作家家里做客）。
⑥《和拉维（红色权利报）记者的谈话》，载苏联《文学报》一九五八年四月十日。

⑦《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夕与格鲁吉亚的新闻记者发表的声明》，载苏联《文学报》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四日。
⑧《光荣地为人民共和国——在欧洲作家会议上的发言》，载苏联《文学报》一九六三年八月六日。

（原载《文艺报》一九六六年第五期）

一个“人的命运”——现代修正主义文艺黑旗

齐学东 郑机兵

肉“大家平分”，只为了保住性命，以敌人的布施为“恶毒”，什么反战情节，早都给九霄云外去了。

更有甚于这个，索科洛夫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反法西斯英雄。一九四四年，苏联红军大败希特勒的法西斯军队。希特勒匪徒在战斗中搜罗戈拉，法西斯军官说：“谁在前线或者战后当过司机的，向前一步走。”他“就前进了几步”，从此就可法斯少校开汽车。“去修理工厂”，抵抗苏军向柏林进发，赤裸裸地背着背黑巢的勾当。

这就是这样一个懦夫、怕死鬼、叛徒、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评论家吹捧他具有“英勇、刚毅、自豪和灵魂美”。作者让索科洛夫自我鉴定为有“德国人的骨气”，还给他涂脂抹粉，加上“英雄”的外衣；他不敢怕死怕投降，而且从俘虏营里两次逃跑，第二次逃跑，还回到了法西斯少校。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在战斗胜利岁月，我们的革命者、共产党员亲手杀了一些叛徒，这是英雄之举。但是，索科洛夫这样一个懦夫、怕死鬼、叛徒，竟做出背叛叛徒的“英雄行为”吗？这完全是资产阶级活活逻辑的主观幻想！作者制造这个虚假的情节，给了给叛徒加上光彩面，他还要进一步把胆小鬼小兽共产党员加以对比，说明共产党员不如胆小鬼小兽小兽比共产党员。你看，共产党员不如叛徒小兽，其中之一的被牺牲叛徒的伪英雄，还称呼叛徒为“同志”，“苦衷家叛徒不要出卖自己。肖洛霍夫爱想这样““前叛期”，美化了胆小鬼，又丑化了共产党员，可见其用心之毒辣。

索科洛夫为什么懦弱？无非是保命第一的思想。降而保命，则降；降而不能活命，则逃。一切是为了“活命”。他之所以把把德寇戈拉投降叛徒，也无非是因为没有这有一个“叛徒”，就逃不过德寇的封锁线。这是“逃而不战”的降，降也好，逃也好，奴颜媚骨也好，屈服而逃跑也好，万变不离其“活命哲学”之宗。

够了，即使把索科洛夫肉体逼通，除了叛徒灵魂，就是活命哲学，哪里有什么英雄的影子呢？那末，作品不是就没有提到过一个英雄人物呢？不，而面提到的索科洛夫的儿子就是一个自愿参军、履行军人的英雄指指员，他获得过不少勋章和奖章。小说写道：他本来还是个年轻轻轻生儿育女，幸福地生活下来，但是，他年纪轻轻就被打死了。英雄的一生竟是如此悲惨！而索科洛夫虽然生犹死、被俘投降，但是，谢天谢地，他毕竟活下来了。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生死观。那末，革命文艺作品可以写英雄人物为的写叛徒，也可以写懦夫叛徒的苟全生命。问题在于如何写，站在什么立场上去写。肖洛霍夫从投降主义的立场出发，既然叛徒叛徒作为英雄人物来歌颂，肯定英雄生怕的投降逻辑，那叛徒叛徒叛徒一个屠戮者的大则为国捐躯的意义，一手肯定叛徒，一手肯定英雄，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

王国防告诉：“曾卫队长，战战兢兢，索科洛夫来到。”“前叛期，如此忠贞！敌人嘲弄他。”“他死于一杯吧，假借，为了德国国家的胜利。”他叛徒叛徒，由意而来，“为自己的死亡而光荣地牺牲而干杯”。他把他要了以后说：“今天我英勇的军队！”完全占领了斯大林人民的解放，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肖洛霍夫竟肯定投降叛变的叛徒，否定为国牺牲的英雄，这是对苏联广大劳动人民的莫大污蔑，是对苏联红军的莫大污蔑！

反法西斯战争之敌，索科洛夫一方面怀着“悲愤”、“忧愤”的感情，日思夜想着战争；另一方面却又以“人道”的心肠同情着叛徒瓦尼亚大兽。作者写他如何给瓦尼亚吃好、穿好，而且为了“不

的现代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点观察和表现战争，完全抹煞革命战争的阶级性质，疯狂地歪曲、丑化和反对革命战争。既然肖洛霍夫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点出发，把投降战争的阶级性，认为战争“不道”，反对战争，就必然在作品中渲染战争恐怖，宣扬战争毁灭一切。《一个人的命运》把革命战争歪曲为一次空前的大浩劫、大毁灭。它把这场战争的矛盾，即苏联人民与法西斯之间的阶级矛盾歪曲为人类战争的矛盾，在这个矛盾中，人民只有一个结局——毁灭，这不是物质上的毁灭，而且是精神上的毁灭。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必须以阶级分析的观点对待战争问题，明确分清战争的正义性质与反正义性质，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因此，直捣“战争毁灭论”，还应指出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革命战争万能论”，这是决定战争题材之阶级性质的根本问题。

毛主席说：“有人笑我们说‘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又说：“杆子造出一切东西，杆子杆子”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族运动。”因此，革命作品必须如实地表现革命战争如何抵抗资产阶级主义的侵略，如何推翻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罪恶压迫，如何使劳动人民破碎锁链的锁链，获得整个解放，从而使提高人民的阶级觉悟，使伟大的人民革命意志和团结精神。总之，“革命战争万能论”是战争题材革命作品的总绳。

当然，并不是说我们的作品不可以表现战争中的牺牲和破坏，而是必须表现以我们的正义性质和人民革命热情为基础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在革命战争中，英雄的人民必然从牺牲和胜利的浓烟中，看见胜利的曙光，从而引起更大的力量、勇气与决心，即使某个部分遭到毁灭，但反动派毁灭不了，革命的力量就愈大，反动派毁灭接近于灭亡。只要哪里有人民的革命战争，哪里就有人民的解放，因此，哪里就有反革命的失败，反革命的覆灭。因此革命文艺作品必须用鲜明生动的形象来体现“革命战争万能论”的无比伟大，革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既然肖洛霍夫抹煞战争的阶级性，宣扬“战争毁灭论”，就必然在作品中把战争与个人幸福绝对对立起来。现代修正主义为：“牺牲于天下，个人自危，替之下，只换得一个‘人的命运’和共同毁灭”的矛盾了。于是作品中就必然恶毒地抹黑叛徒。从《一个人的命运》这一小说中根本看不到苏联有任何政治倾向，主人公被迫走投无路，根本不知道为了什么打仗，根本不知道敌人是谁，更谈不上对敌人的恨。只是由于他的叛逃，不得不野兽般地嚎叫一阵。竭力证明叛逃怕死的合理性，歌颂德国行为，竭力辩护投降叛理，怕死有理，投降光荣，怕死光荣。

由此可见，《一个人的命运》所开辟的“新路线”是一条不折不扣的现代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文艺路线。这条文艺路线是为现代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投降路线服务的，也就是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侵略服务的。因此，我们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在战争题材作品上要分清是非，不仅是文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全世界人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要反动的根本问题。

面对着美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在各国人民头上的今天，是教育人民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还是屈服和恐惧人民实行和平主义、投降主义乞求屈辱的“和平”呢？是用人民战争的强阵去消灭人民的革命意志，推翻敌人的帝国主义剥削制度？还是用“和平”的毒舌去安慰和麻痹人民，冲淡人民的革命意志，妄图帝国主义有命呢？这是当前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也是两条根本对立的文艺路线交锋和互相提出来的重大问题。所谓“四海翻腾云雨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谁也无法阻挡全世界人民的反帝怒潮！现代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和文艺路线必然遭到破产的命运。

让世界上人民革命战争的隆隆风雷淹没现代修正主义《一个人的命运》的悲鸣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索科洛夫一样去灭亡吧！自己的“命运”吧！

